

礼佛窟·藏经窟·瘞窟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下）

沙武田

内容提要 莫高窟第464窟可以认为是西夏代表洞窟，但其营建史颇为复杂，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作者经对第464窟历史、考古、图像进行全面分析，发现该窟营建前后经历了多次重修：第一次重修确为西夏时期改造北朝多室禅窟为一座完整的礼佛窟，但前室未画壁画，为素壁；西夏晚些时候，对前室进行了二次维修，制造出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密闭的空间，这两个密闭空间又成为元代中晚期某个时间藏经的地方，使洞窟兼具了礼佛和藏经双重功能。而元代把大量的多民族语言文字的佛经封存在这个洞窟，有可能是作为佛教徒瘞埋的随葬品，从而使得464窟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兼具了瘞窟的属性。

关键词 莫高窟第464窟 西夏壁画 二次维修工程 礼佛窟 藏经窟 瘞窟

三 二次维修和重绘壁画的时代推断

从前述考古信息可知，洞窟甬道和前室有明显的重层壁画，说明在第464窟的营建历史上，有二次维修和重绘壁画的现象。因此需要在此讨论二次维修和重绘壁画的时代问题。

洞窟二次维修时曾加长甬道并绘十身立姿大菩萨〔图三十一〕，前室南北壁和被后来拆毁的西壁甬道口南北侧绘华严五十三参的内容，壁画中均有大量的回鹘文榜题文字。其中经阿依达尔、张铁山、皮特·茨默等回鹘文专家释读之十地菩萨是据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四《最净地陀罗尼品》而来，其回鹘文经典则是据10世纪别失八里的著名回鹘佛教翻译家胜光法师所译文本^{〔1〕}。对此经典的研究，早年日本学者护雅夫已有考释，认为是10—12世纪

〔图三十一〕第464窟甬道残存菩萨像



〔1〕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回鹘文榜题研究》，《民族语文》2012年第3期，页78—80；张铁山、彭金章、〔德〕皮特·茨默：《敦煌莫高窟北区B464窟回鹘文题记研究报告》，《敦煌研究》2018年第3期，页44—54。

〔图三十二〕莫高窟第332窟甬道南壁蒙古人供养像



〔图三十三〕榆林窟第6窟二层明窗位置蒙古人供养像



回鹘僧人僧古·萨里翻译^{〔1〕}。杨富学指出此回鹘文应出自元代敦煌的回鹘人之手，具体则是与回鹘关系密切的元代统治瓜沙地区的幽王家族，并最终推断幽王家族是第464窟真正的供养主，同时又根据该窟出土元至正十年(1350)的回鹘文密教文献《吉祥胜乐轮》，认为最后重修的时间不迟于1350年，前后室壁画绘制时间相差不远，“百年以内当大致不误”^{〔2〕}。

按杨富学的研究，如果重绘壁画属于元代，为什么完全没有蒙古供养人信息？相比之下，却可在莫高窟第332窟甬道南北壁〔图三十二〕、榆林窟第6窟二层明窗位置〔图三十三〕、莫高窟第463窟〔图三十四〕、榆林窟第3窟、榆林窟第4窟看到元代重绘壁画时对供养人画像的重视，这也可从莫高窟《六字真言碑》中出现的幽王家族大量的人名得到体现。如此重视供养人画像的蒙古幽王家族，为什么营建了第464窟却不画供养像？实难理解。

但若是西夏人营建的洞窟，在窟中不画供养人像则正是这一时期营建的一大特征和基本现象^{〔3〕}。另外，洞窟地面上铺花砖的情况和莫高窟西夏时期重修的其他洞窟也很类似〔图三十五〕，均以西夏和之前曹氏归义军时期常见的多种类型花砖铺面，其中三珠火焰纹即是西夏时期新出现的花砖^{〔4〕}，具断代意义。

这一推断也可得到西北角和西南角素壁白粉层上西夏文墨书和刻划题记的佐证，当是二次维修时工匠或功德主所题。同时，这里也出现了刻划的回鹘文六字真言，有可能是西夏时期回鹘人所为。

〔1〕 [日]护雅夫(李树辉译)：《回鹘语译本〈金光明最胜王经〉》，《语言与翻译》1997年第4期，页24—28；[日]护雅夫(李树辉译)：《回鹘语译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续)，1998年第1期，页21—27。

〔2〕 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页16。

〔3〕 沙武田：《西夏时期莫高窟的营建——以供养人画像缺失现象为中心》，《西夏学》第十五辑，页100—127，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

〔4〕 潘玉闪、马世长：《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页75—80，文物出版社，1985年。

〔图三十四〕莫高窟第463窟元代壁画



〔图三十五〕第464窟内铺花砖情况



此外，前室二次重修壁画整体上仍然有强烈的西夏艺术风格特征，特别是十地菩萨的脸形是西夏菩萨的典型面相；另，十地菩萨榜题两旁圆圈中所绘人物〔图三十六〕，与后室正壁壁画中的观音像表现手法一致，也与观音经版画中起首大圆圈中观音表现手法相统一，整体上仍然是西夏艺术的延续。其他五十三参画面虽然残破严重，但其中人物形象特征和画面中山、水、树的画法与西夏时期更为接近。

至于前室新出现的十地菩萨，以及把华严五十三参作为洞窟前室南、北、西三壁主题绘画，考虑到十地菩萨的华严属性，因此二次重绘时洞窟前室整体上表达出了浓厚的华严思想^①，而华严思想是西夏佛教“大系统”中的核心内容，也是以汉传佛教为代表的西夏“官方佛教”的根本问题^②，体现出了深厚的西夏佛教传统和思想，所以二次维修工程其实也是西夏核心佛教思想的体现。

考虑到二次维修所绘壁画榜题全是回鹘文，故初步判断，甬道和前室壁画有可能是西夏时期的回鹘人所为。对于西夏时期的回鹘佛教、回鹘僧对西夏的影响，文献记载清楚，学者们论述较多，杨富学和陈爱峰有专题研究^③。另外，据文献记载，西夏时期不仅回鹘人活跃在西夏境内，且任职于西夏社会，《天盛律令》记载^④：

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此

〔图三十六〕第464窟甬道十地菩萨残剩部分

采自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敦煌艺术品IV》页35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①〔德〕P.Zieme, Toyinkorklug, "An Old Uigur Buddha Poem," *Studies on the Inner Languages*, XXVIII, 2013: 7-37.〔德〕皮特·茨默著(王平先译)：《解读敦煌文献 B464:67 的回鹘文诗歌》，《敦煌研究》2017年第1期，页31—34。

②〔俄〕索罗宁：《西夏佛教之“系统性”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4期，页22—38。

③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中编“宗教与文化交流”第一章“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页155—177，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

④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〇“司序行文门”，页378，法律出版社，2000年。

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官高低，当以番人为大……又番、汉、降汉、西番、回鹘共职者，官高低依番汉共职法行事。

且回鹘文在西夏时期也使用，《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记^①：

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告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学、汉学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学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学掌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家在诸字之右，故蕃学院特重。

据以上史实可以认为，西夏洞窟壁画中出现回鹘文榜题也是有可能的。故谢继胜认为第464窟重修的壁画也有可能是西夏后期的作品^②，现在看来不无道理。因此，本文认为二次维修及壁画的绘制时代，仍然是西夏时期。

根据以上的时代判断，说明西夏人在原北朝多室禅窟的基础上，先后两次对第464窟进行了改造维修。第一次改造只对后室画壁，前室如同第465窟，未画壁画，但装饰一新，四壁与窟顶衔接处画黑红边饰；第二次改造则在前室素壁上画壁画。同一时期重修，看似有些不合常理，但其实完全符合西夏在莫高窟基本的洞窟营建方式方法，即大量重修重绘前期洞窟。

四 窟内出土文物与洞窟时代判断

探讨第464窟营建史，并对其进行年代判断，不仅涉及对洞窟现有考古信息和壁画的分析，还涉及对该洞窟出土文物的讨论。

（一）对洞窟废弃现象的疑问

第464窟作为有壁画和塑像的礼佛窟，确与其他洞窟有一个较大的不同之处，即先后经过多次工作，窟内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文献，流散于世界各地，其中有记载的共有四次，分别是1908年伯希和^③，第二次是1921年滞留敦煌莫高窟的白俄残部^④，第三次是1941—1943年张大千^⑤，第四次是1988年敦煌

①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页146、147，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另据聂鸿音：《“蕃汉二字院”辩证》，《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页68—69。

② 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页72。

③ [法]N.Vandier and M.Mailland,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 I-VI*, Paris, 1920-1924. [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页383，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日]森安孝夫：《回鹘语文献》，载《讲座敦煌·敦煌胡语文献》页9—12、31—98，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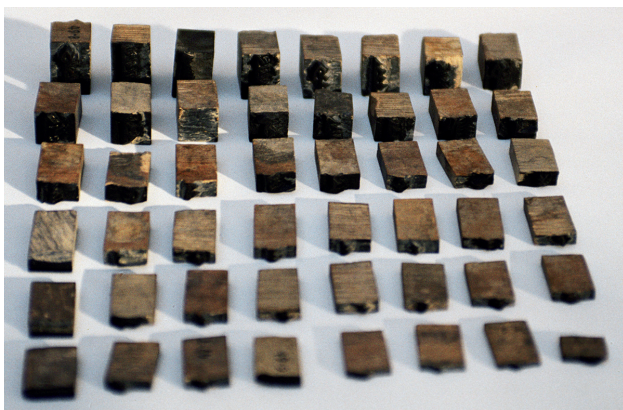
④ 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页43，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⑤ 王三庆：《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卷》，《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79—98，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

研究院有组织的科学的莫高窟北区考古工作，在第464窟的沙土中又发现了残剩的各种语言文字文献90余件，还有包括木活字在内的其他文物〔图三十七〕^{〔1〕}。对这几次出土所见文献资料，前述杨富学亦在其文章中有过讨论，认为“以印本居多，大多属元代之物”。另外，俄登堡考察队1914—1915年间考察莫高窟，在《俄藏敦煌艺术品》公布的洞窟照片中，就有第464窟的壁画。

理论上而言，对于供信众日常膜拜观瞻的佛窟，出现如此内容和数量丰富的藏品，除非其为曾经的藏经之所，如刘永增所言为莫高窟“第二藏经洞”^{〔2〕}，否则只能是完全废弃不用后才能出现的情况。因此，第464窟作为藏经窟的属性，值得做些探讨。

〔图三十七〕第464窟发现的木活字



（二）洞窟使用年代

伯希和据发现的回鹘文本活字提出此窟为回鹘时期“刊经厂”^{〔3〕}，但把第464窟作为印经窟，无论从其本来的性质、所处的位置环境、洞窟的空间规模、交通条件等各方面都不能让人信服。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根据第464窟出土大量回鹘文文献推断洞窟时代为14世纪早期到中期^{〔4〕}。有关森安先生对年代判断的思路与方法，杨富学在文中也已进行过讨论^{〔5〕}，本文认为杨富学的看法是正确的，大量文献的出土其实只能证明洞窟的废弃不用。如果依然在使用着的洞窟，无论如何是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文献堆积情况的。第464窟出土文献以元代为最多，只能说明到了元代的某个时间段第464窟便遭废弃了。

遗憾的是，到了讨论北区洞窟群和第465窟年代问题时，杨富学在文章中却又回到被他批判过的森安的思路，把出土大量元代文献的北区洞窟和存在多条元代游人题记的第465窟，划为元代营建的洞窟^{〔6〕}。杨文的依据即是这些理应属于洞窟废弃之后出现的现象和留下的文献文物，但仅以此作为时代判断的标准和依据，实难让人信服。

同时，笔者还注意到洞窟后室东壁门两侧的西夏花卉，后期用白粉粉刷后书写回鹘文，据张铁山、

〔1〕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页53—108，文物出版社，2004年。

〔2〕 刘永增：《回鹘写本与敦煌莫高窟第二藏经洞》，《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页40—44。

〔3〕 前揭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页383。

〔4〕 [日] Moriyasu Takao,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 (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0, 1982, p.15; [日] 森安孝夫（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页46。

〔5〕 前揭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页9。

〔6〕 杨富学：《裕固族与敦煌晚期石窟》，《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页46—57。

皮特·茨默的释读¹¹，后室东壁甬道北侧仅存一行回鹘文题记，汉译文：

（佛咒）（我）顶礼膜拜供敬三宝。

而后室东壁甬道南侧的回鹘文题记书写美观，可判断是一首以押头韵诗写成的回鹘文佛教诗歌，共27行，这些内容被研究者认为属元代回鹘文。

这些内容虽然与佛教礼拜有关，但以此形式出现在洞窟壁画上面，还是具有游人题写的性质，可认为这些回鹘文题记应出现在二次维修之后。

因此，从洞窟出土物分析，第464窟应为元代之前的洞窟。由于元代在敦煌的统治达一个多世纪，同时考虑到佛教洞窟作为礼佛空间，后人可以继续使用，加之元代统治敦煌地区的蒙古幽王家族对佛教的虔诚礼拜¹²，第464窟的使用延续到元代早中期的可能性也很大。其中，被学界认为是出自第464窟有1350年纪年的回鹘文《吉祥胜乐轮》文本，虽然是帮助判断洞窟废弃时间的重要参考，但该文献是否出自第464窟¹³仍然需要辨析后方可作出定论，如果该文献确实出自第464窟，在没有其他更晚纪年资料的情况下，则只能作为第464窟废弃的一个可能的时间参照点，即不能早于这一年。而杨富学视此纪年为洞窟二次重修的时间下限，实可商榷。

五 窟中藏经问题

在基本厘清洞窟两次营建和壁画的时代问题后，接下来需要对第464窟出土的佛经残片做些梳理，探讨洞窟作为莫高窟“第二藏经洞”的问题。这则涉及佛经入藏的时间、洞窟中藏经的具体位置，以及窟中藏经的具体原因等诸多问题。

（一）公主脚的困惑

前述20世纪既有伯希和、白俄士兵、张大千至少三次挖掘活动，另有敦煌研究院考古清理，总共有多达千件以上包括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藏文、婆罗迷文、梵文等多民族语言文字佛经和近千枚回鹘文木活字出土，另若考虑俄登堡考察队也对该窟进行过考察和拍摄活动，或亦挖走不少佛经类文物。这些都说明第464窟存有数量丰富的各类佛经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此外还应包括敦煌研究院考古清理时出土的陶器、瓷器、木器等文物，以及可能还有一具尸骨和若干陪葬品¹⁴。以上情况充分表明该窟的复杂性，难怪被敦煌研究院的专家称为莫高窟“第二藏经洞”¹⁵。

11 前揭张铁山、彭金章、皮特·茨默《敦煌莫高窟北区B464窟回鹘文题记研究报告》，页44—54。

12 张海娟、杨富学：《蒙古幽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页84—98。

13 [日]庄垣内正弘：《ウィグル語写本・大英博物館蔵Or.8212-109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6卷1期，1974年，页44—57。

14 前揭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页104—108。

15 前揭刘永增《回鹘写本与敦煌莫高窟第二藏经洞》，页40—44。

〔图三十八〕1941年，英国人李约瑟在中寺拍摄的照片（孙志军先生提供）



〔图三十九〕第464窟前室西北角



首先从一则“传说”谈起，现今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藏有一只传为元代公主的脚，呈干尸状。据传，该脚于20世纪20年代遭白俄士兵从第464窟盗挖出土。相关文字最早见于于右任的记述，其论又系传自张鸿汀（即张维）的道听途说^{〔1〕}，后来敦煌研究院史苇湘先生也有记载，但来源不明^{〔2〕}。1941年，英国人李约瑟在中寺拍过一张照片，包括一只脚、一只手和一只棉鞋〔图三十八〕，其中的脚即传出自第464窟，即公主的脚，但没有任何证据。

杨富学在论第464窟时代的专文中据此公主脚的“传说”而认为该窟是元代埋葬死者的瘞窟，并推断此“元代公主”为瓜沙蒙古幽王家族“曾出家为尼的某公主，亡后瘞埋于第464窟”^{〔3〕}，但此说只能流于假设。

事实上，通过对该窟考察史进行梳理可知，传说中的“元代公主”墓是1921年白俄士兵乱挖发现的，实际上之前1908年伯希和、1914—1915年俄登堡两次考察中均对此窟进行过拍摄，照片明确显示早在1908年时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密封空间已被拆除，已是今天的现状，因此，1921年白俄士兵从这里再挖出“元代公主”墓及其陪葬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至此“元代公主”传说可以确定并非事实。

（二）洞窟藏经的时间

接下来探讨洞窟藏经的问题。考虑到出土文物中有大量民族语言文字的佛经，其中回鹘文、西夏文，尤其是蒙古文佛经数量丰富，整体上符合元代河西地区多民族共存的历史情形^{〔4〕}，初步推断这些藏经属于元代时期所为。以上推断还面临一个问题：偌大一个洞窟，这些佛经文物被封存在什么位置？

前述传说洞窟埋葬元代公主之事，通行的说法是死者被安置在洞窟前室西北角密室中，即二次维修时延长甬道、缩小前室所形成的封闭空间〔图三十九〕。确实，洞窟前室二次维修时形成的西北角和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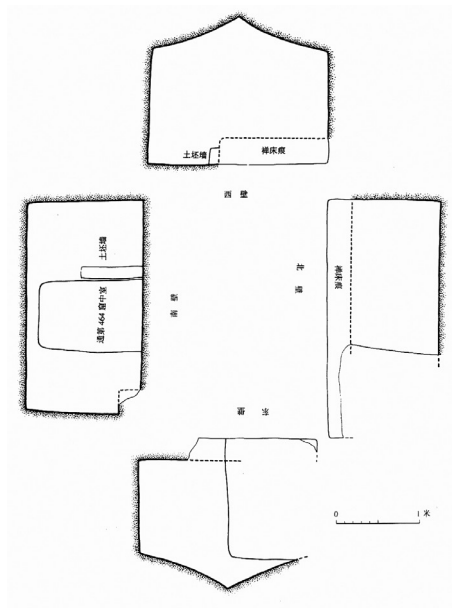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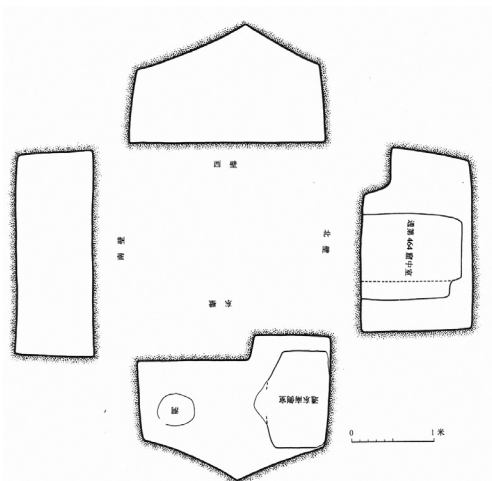
〔1〕 参见车水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志（下）》，页69，台北：擎松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2〕 前揭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页43。

〔3〕 前揭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页12、15。

〔4〕 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幽王家族到裕固族大头目》，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

〔图四十〕第464窟西北角和西南角小禅窟现状
采自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
图版二八，页59、60，文物出版社，2004年



角密室，很适合作为藏东西的空间。

但是，如按前述将二次维修的时代推断到西夏晚期，而佛经的入藏却无法早到西夏时期，那么这些藏经如何进入到西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密封的空间？显然，无法从前室破壁放入，只能想其他办法。幸好，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位置有原属北朝多室禅窟的两个小禅室，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小禅室虽然被西夏人封闭起来，但是可以分别从两侧的邻窟（现编号北160窟和北161窟）进入，直达两个小禅室，这在北区考古报告中有详细描述，并有相应图版可供参考〔图四十〕。

笔者曾参加过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考古工作，对莫高窟北区所有洞窟均有考察，撰写过北区洞窟考古简报^{〔1〕}，整理过北区的考古出土物。第464窟南北两侧被封闭起来的四个小禅室（其中两个即前述该窟前室西北角、西南角的两个小禅室），笔者于1997年时曾跟随彭金章先生多次至现场考察，并从第464窟南北两侧的洞窟（即北161窟、北160窟）进入这四个小禅室，这一点也在北区考古报告的联合平面图上有所标示〔图四十一〕。由于第464窟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有明显被人为封堵起来的小门，即两个小禅室的原本出入口，因此，元代藏经时若从第464窟两侧洞窟进入，则无需改动第464窟的前室原貌。所以洞窟礼佛窟的性质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照常开放供人礼拜供养。

结合洞窟空间，以及现存遗迹，西北角原封闭小室确实可以看到原北朝时期小禅室被后人打开，现又被人为封堵的状况〔图四十二〕。该处原北朝小禅室之所以被人为打开，应当即是原来埋藏佛经时留下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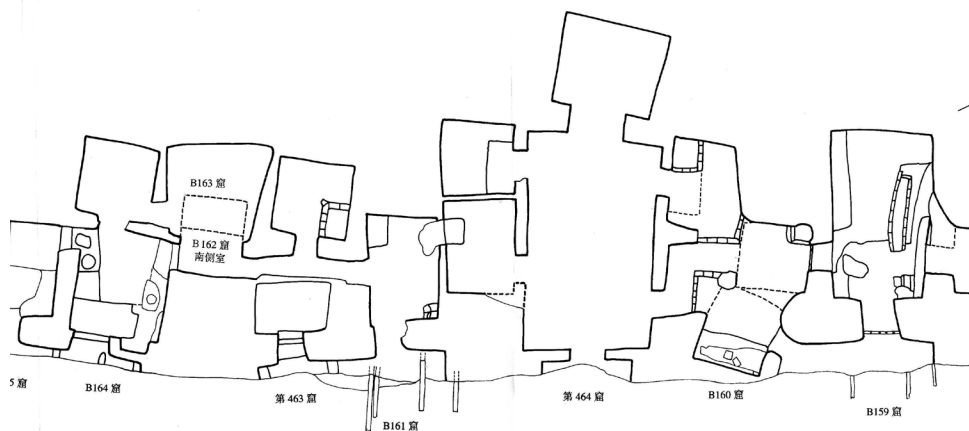
六 藏经与瘞埋

洞窟藏经事例，最典型的莫过于莫高窟藏经洞，对其性质、封闭原因等问题一直是敦煌学界长期以来热烈讨论的焦点，是大家熟悉的学术史。但到今天为止，对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和性质仍然没有

〔1〕 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0期，页4—21。

〔图四十一〕第464窟所在崖面洞窟联合平面图

采自彭金章、王建军著：《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图四 B157—B173 窟平面图（内含第464窟、第463窟）

〔图四十二〕被人为封堵的原北朝小禅室门洞

采自前掲彭金章、王建军著《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



统一的答案。因此要讨论第464窟藏经的原因，同样困难重重。

这里，我们把目光再回到“元代公主”瘞窟的传说上来。虽然元代公主只是个“美丽的传说”，但是考虑到北区大量瘞窟的存在、大量多民族语言文字佛经的入藏，综合分析，虽然本文并不认同“元代公主”之说，但在窟内葬人仍然是有可能的。之所以有此传说，或许是基于洞窟作为瘞窟埋人而演绎的结果。

同时，考虑到元代的瘞埋活动一直持续存在，且目的性强，要求神人共处，因此选择第464窟之一西夏人营建的较新的洞窟，把大量的佛经、木活字等作为陪葬品一同封入西北角和西南角的密室中，从而使得第464窟兼具礼佛窟、藏经窟与瘞窟的多重性质与功能，这在佛教瘞埋历史上属于仅见的一例。实际上，这和俄国入科兹洛夫于1909年挖出大量西夏藏经的黑水城“辉煌大塔”〔图四十三〕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因为这个塔中同时也埋葬有一具女性尸体^{〔1〕}，被俄国学者孟列夫认为是出家为尼的罗太后^{〔2〕}，罗太后之说虽然没有任何根据，仅是“一个浪漫的假设”^{〔3〕}，但这种瘞埋僧人或佛教徒的方式，与第464窟颇有相似之处，实是有趣的现象，说明元代人在第464窟的瘞埋活动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

另外，元代人选择第464窟作为葬人之所，也与之之前西夏人在洞窟中留下的壁画有很大关系。后室的五方佛曼荼罗属于金刚界密乘图像，这一图像体系在西夏时期由来自天竺的僧人不动金刚进行了改造，将其添加到瑜伽焰口施食仪中，并将焰口施食法置于曼荼罗坛场中，其所集的《施食仪文》被称为“蒙山施食”^{〔4〕}，他本人也由原本独传金刚密教的“金刚上师”变成了以擅长行超度孤魂饿鬼及六道众生“度

〔1〕 参见〔俄〕克恰诺夫：《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2〕 〔俄〕孟列夫（王克孝译）：《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页46、65、66、75，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3〕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页8，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 《大忏悔文略解》之《宋西夏护国仁王寺金刚法师不动集》，载《嘉兴藏大藏经》第30册，NO.B260号。

〔图四十三〕黑水城辉煌大塔原照

采自前揭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敦煌艺术品IV》“序言”



〔图四十四〕东千佛洞第2窟窟顶的五方佛曼荼罗



孤”法事的“甘露法师”。因此，西夏洞窟中出现的金刚界五方佛曼荼罗主要表现的是灭罪、救度、荐亡的功能与思想，最典型的事例是东千佛洞第2窟窟顶的五方佛曼荼罗〔图四十四〕，常红红有专题研究^{〔1〕}。

至于洞窟南、西、北三壁的观音三十三现身内容，其表达的核心是观音救度思想，西夏洞窟中大量出现的水月观音及其表达的救度、往生净土信仰，不仅可以得到黑水城大量水月观音图像的证明，也可得到敦煌石窟西夏洞窟水月观音的佐证^{〔2〕}。

更为重要的是，后室东壁门上的梵文六字真言陀罗尼，因为其代表的是观音六字大明陀罗尼，其形象一般为密教的四臂观音，与窟内正壁中上部圆圈中的水月观音形象〔图四十五〕相呼应，当然也与其他各壁的观音化现内容相一致。至于在西夏时期已经非常流行的称念、诵读、书写六字大明陀罗尼所能够带来的无上利益，前文已有述。尤其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梵文六字真言，在宋、金、西夏、辽代墓葬中都有丰富的考古发现，或出现在西夏墓中盛骨灰的木缘塔上〔图四十六〕^{〔3〕}，或出现在辽代墓葬的小木棺上〔图四十七〕^{〔4〕}，或出现在宋墓壁画中^{〔5〕}，其用意是利用这些梵文陀罗尼真言秘密而强大的法力，尤其是其破地狱和救助死者转生净土的特殊功效。此类实例还可见于内蒙古敖汉旗喇嘛沟辽墓，在墓室北壁、

〔1〕 常红红：《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壁画研究》页141—148，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2〕 参见前揭常红红《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壁画研究》相关章节讨论。沙武田：《水月观音图像样式的创新与意图——瓜州西夏石窟唐僧取经图出现原因再考察》，《民族艺林》2019年第1期，页5—26。

〔3〕 陈炳应：《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题记、葬俗略说》，《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页190，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黎大祥、张振华、黎树科：《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5〕 宿白：《白沙宋墓》页38，文物出版社，2002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宋金壁画墓》页136—158，科学出版社，2005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市文物局：《河南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文物》2001年第10期，页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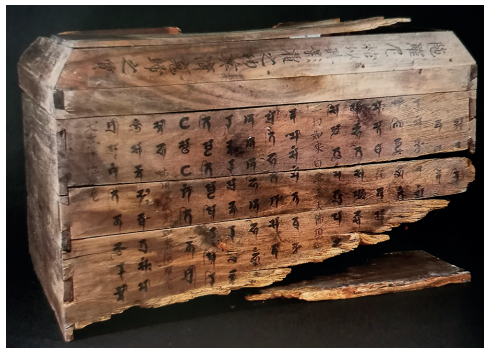
〔图四十五〕第464窟后室正壁观音化现壁画



〔图四十六〕武威西夏墓葬木缘塔上的梵文真言
武威市博物馆提供



〔图四十七〕辽代墓葬木棺上的陀罗尼真言
采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彩版四，文物出版社，2001年



西北壁、东北壁以及东、西两壁等处墨书长短不一的梵文经咒，同时在该墓顶北侧还遗存有汉字题记一行：“真言梵字触尸骨，亡者即生净土中；见佛闻法亲授记，速证无上大菩提！”^{〔1〕}第464窟现存前室南北壁东段门两侧出现的两铺多体字六字真言〔图四十八〕，应该是和二次维修同一时期的作品，也有为死者灭罪、度亡、往生的强烈愿望寓于其中。

由上可知，元代人之所以要选择第464窟作为埋葬佛教徒的地方，实是对后室壁画强大的灭罪、救度、荐亡、破地狱、往生净土功能与思想的充分了解基础上的行为，也可以认为是有深厚佛学修养者的选择。因此，被传说为“元代公主”的人物，极有可能是一位高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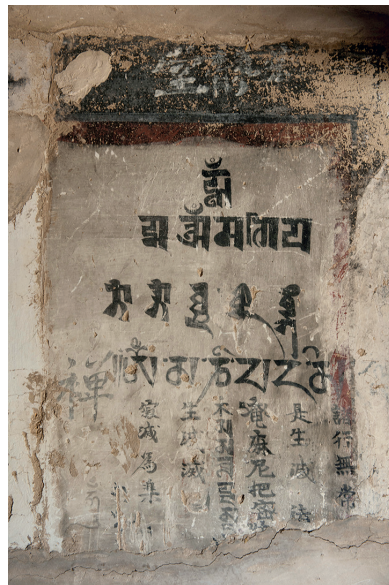
七 结语

长期以来，学界对莫高窟第464窟营建时代判断的主流意见，即西夏时期营建，后经元代重修，现在看来需作些修订，前后两次维修均为西夏时期。

整体而言，作为西夏一期工程营建的第464窟，后室西夏壁画浓厚的观音救度、灭罪、荐亡、往生的思想，实是重实践轻理论的西夏佛教的真实体现^{〔2〕}；而宽大的前室，又给洞窟内进行相应的仪式提供充足的空间，当是重仪轨的西夏佛教的产物；至于观音思想与西夏极为盛行的西方阿弥陀净土之间密切的关系，在第464窟同样得到体现。

到了西夏更晚的某个时间段，又对该窟进行了二次维修，改造前室空间，甬道和前室现存壁画即是

〔图四十八〕第464窟前室东段门两侧的多体六字真言



〔1〕 邵国田等：《敖汉旗喇嘛沟辽代壁画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页92。

〔2〕 参见沈卫荣：《西夏佛教文献与历史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

这次工程作品。再到元代中晚期，又把该窟作为藏经和瘞埋的理想场所，把当时常见的多民族语言文字佛经文书等文献，通过特殊的方式封存在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的两个密封空间内，而这次藏经有可能是僧人瘞埋的随葬行为，最终使得洞窟的性质由礼佛窟变为兼具藏经窟和瘞窟，但礼佛窟的功能仍在延续，实是佛教石窟寺中兼具礼佛窟、藏经窟、瘞窟的不多例证，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

同时，第464窟作为西夏洞窟又经元代再利用，为理解西夏元时期莫高窟北区石窟的使用情况提供了新资料，在¹⁴C对第465窟科学测年的基础上，通过考古和艺术史的推断，再次让我们看到与第464窟相邻的第465窟作为西夏洞窟的真实度和可靠性，而且也为元代时第465窟的继续使用提供旁证，值得进一步思考。

至于洞窟甬道和前室二次工程所绘具浓厚华严思想的壁画题材，当属西夏佛教“大系统”中的核心内容，体现出深厚的西夏佛教传统和思想。至于元代的藏经和瘞埋行为，应该是从洞窟两侧的北160、北161二窟出入来完成。由此可见，西夏人和元代人前后多次洞窟营建工程，使得第464窟的性质发生多次变化，实是洞窟营建史上有趣的案例。

附记：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敦煌研究院王慧慧副研究员、李国副研究员、赵晓星研究员、孙志军副研究员、朱生云馆员，中央民族大学张铁山教授，新疆大学阿依达尔教授及《故宫博物院院刊》匿名审稿专家提供了相关的资料、信息、图片及指导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本文使用敦煌洞窟和文物图片，均为敦煌研究院提供，版权归敦煌研究院所有。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谭浩源)